

谷牧

改革开放

前线指挥官

石建国



回望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传奇的“第一次”是由他书写的：是他的第一份出国考察报告促动了中央实行对外开放的决心；是他为改革开放引进了第一笔外资贷款；也正是他的协调推动，拉开了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的大幕。他，就是改革开放的前线指挥官——谷牧。

对外开放的先遣者

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启动。在这个重大决策背后，就留下了谷牧的身影。

1978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奉党中央之命，率领代表团赴西欧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由国家领导人担任团长的政府经济代表团。这对于此前从未有任何出国经历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30多天的考察中，谷牧一行奔波在不同的国家，先后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等5国。在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见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建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10个行不行？”在联邦德国，一些州长表示可以提供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贷款给中国。西方国家政府渴望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心情溢于言表。

在西欧各国热烈的欢迎氛围中，代表团成员也感到了中外的巨大差距，内心很受震动。联邦德国的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第一线工人只有900多名；而我们国内则需要8万人。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

铁厂，从采矿到轧钢，年产350万吨钢，只有7000名职工。而我国武钢年产230万吨钢，却有职工6.7万人。差距之大，让代表团成员感受到了紧迫感。

回国以后，谷牧向邓小平汇报了此行的出访情况。谷牧的考察报告和汇报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中国落后西方国家20年；第二，在引进技术装备的同时，也应当利用外资，迅速发展自己；第三，要改革僵化的经济体制，特别是外贸体制。

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高度肯定了汇报的内容和建议，并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并最终促成了中央推行对外开放的决心。



1978年，谷牧（中，挥手者）率团考察西欧5国

引进外资的探路者

尽管早在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就已经开始施行，也开始有外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办企业。但从当年7月到年底，全国总共才批准了6个合资项目，还都是餐馆、养猪场、照相馆等小项目，投资金额也仅仅有810万美元，地点也仅限于深圳和福州两地。外资引入犹如星星之火，但其燎原之势远没有展现出来。

改革启动需要巨额资金，但这一缺口仅靠国内

难以填补。由于“文革”刚刚结束，当时国内还深陷在“一无外债、二无内债”的自我禁锢中。以往只是引进国外设备，少有利用外资的先例。

为了解决这庞大的资金来源问题，谷牧同其他中央领导一样，也在苦苦地思索着。

当时，谷牧接到了日本对华友好人士传来的信息，说日本政府有一笔向发展中国家贷款的“海外协力基金”，利率极低、搁置时限长、本息偿还期长，中国可以争取使用，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须由中国先开口。

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谷牧决定放下历史恩怨，放眼未来。经过几轮磋商后，1979年9月，谷牧访问日本。谷牧的来访受到了日本方面的热烈欢迎。但他访日之事却遭到了老母亲的责备，因为当年侵华日军的暴行给老人家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然而，正是谷牧的这次访日之旅，促成了为数500亿日元的中日第一笔贷款协议，年利率3%，还款期30年。同时，这样的举动也打破了我国“不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的思想禁区，促使我国政府迈开了使用国外贷款的步子。

经济特区的组织者

1979年4月，中央召开专门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广东省借此想要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审批权）和钱（外汇），允许广东“先走一步”。会上，广东省委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个设想表示赞同，并在不同场合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为此，谷牧再次担当重任，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帮助广东、福建两省省委、省政府进行研究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提请中央讨论决定。

同年5月至6月，谷牧带领国务院相关职能部委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作调查，共历时26天。

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组集中大家的意见，最后形成的大体思路是：广东、福建两省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应扩大两省管理经济的权限，可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大包干。经济计划上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的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

按照这个思路，谷牧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又帮助福建省委起草了《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

党中央认真讨论并批转了这两份报告。至此，中央关于特区政策的大体轮廓形成。在谷牧的协调下，经济特区的各项工作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我国对外开放先行先试的大幕由此拉开。

此后，谷牧作为中央工作组的组长，会同有关部门同志做了大量的、具体的协调和组织工作，积极推进特区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和完善。1987年，谷牧负责筹备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努力推动海南的经济发展，为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海“70后”副市长亮相



姚明章子怡参与特奥活动

1月30日，在韩国举行的第十届冬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场，特奥会形象大使章子怡、姚明与智障运动员亲密接触，参加了一场雪鞋行走接力的游戏。

姚琪琳摄



甜美的微笑，婀娜的舞姿。舞蹈《千手观音》在2005年CCTV春节联欢晚会的亮相，被很多人称为晚会最成功的经典之作。在不到6分钟的时间里，21位聋哑演员近乎完美地演绎了《千手观音》有关爱的主题。很多观众是流着泪看完这个节目的。在这次晚会上，人们熟记了一张美丽的面孔，也记住了一个名字：邰丽华。

浅浅的笑容，清澈的眼神，优雅的举止。接受采访时，她始终微笑着，认真地“倾听”提问，然后愉快从容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她修长的双手在笔者眼前飞舞，仿佛在表演一段心灵的舞蹈。

春晚舞蹈经过3次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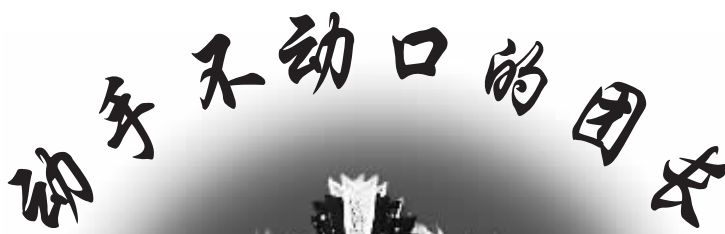
其实，这年春晚上演出的《千手观音》是这个舞蹈的第三个版本。2000年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应邀出访美国，作为艺术团终身艺术指导的张继钢创作了这个舞蹈。在张继钢看来，“特殊的艺术也是艺术。没有好的艺术作品，仅凭聋哑人表演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向美国人展现真正的特殊艺术，张继钢创作了名为“我的梦”的整套晚会演出，其中《千手观音》便是重中之重。第一个版本的《千手观音》中只有12个女演员，舞蹈表演效果非常好，在美国引起了轰动。

到了2004年雅典残奥会，作为闭幕式8分钟演出的总导演，张继钢又重新修改了剧本，演员增至21人，手的变化丰富了几倍。在“中国8分钟”里，由邰丽华领衔表演的舞蹈《中国梦——从奥林匹亚到紫禁城》就占用了其中的6分钟，由此足见这个舞蹈的分量。2005年春晚，张继钢又在此基础上做了细微调整，如增加了祝福人间的环节。节目不断改进，邰丽华自始至终担任着领舞。

5分54秒背后的磨砺

5分54秒，对于一个春晚节目来说并不算长，而对于21个聋哑演员而言，却意味着漫长而艰难的磨砺。邰丽华透露，每一场排练中，手语老师和排练老师都要贯穿始终。手语老师翻译导演意图，充当演员们的“耳朵”。手势就是“乐谱”。手语老师要调动激情去指挥，用动作

“千手观音”邰丽华



余 玮

表情弥补无法进行声音传递的遗憾。演员们有的趴在地板上，耳朵紧贴地面；有的趴在音箱上，双手扶着音箱去感受音乐节拍。在演出的现场，有4位艺术团的手语老师分别位于舞台四角，用手语指挥演员们演出。在无数次的排练之后，演员们对音乐的旋律已经非常熟悉了，音乐已经融入了她们的身体、血液。

“我还是以前的我”

是舞蹈让邰丽华找到了自信，舞蹈对于她来说，是“表达内心世界的语言”。在任残疾人艺术团演员队队长不久，邰丽华就担任了团长助理、艺术总监，还出任中国特殊艺术协会副主席，先后在50多个国家巡回演出数百场，她的演出剧照总是出现在艺术团宣传材料最醒目的位置。

2005年底，也就是上春晚不到一年后，邰丽华被正式任命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很突然，之前没人通知我。”从一名单纯的舞蹈演员，转变为一名负责全国所有事务的行政人员，邰丽华坦言，增加了很多工作。“虽然事情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但是我一直都很快乐。我看着年轻的团员们一天天成长，这种过程非常享受。”邰丽华主抓艺术创作，有几个助手帮助她处理行政工作。

邰丽华身上有着“邻家女孩”那样的率真与单纯。透过她清澈的双目，人们很容易看到她宁静的内心世界。她坦陈：“残疾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元化的特点；残疾不是不幸，只是不便；残疾人，也有生命的价值。”这些年来，邰丽华带领残疾人艺术团开展了大量公益慈善活动和义演，用节俭下来的演出收入注资设立“我的梦”和谐基金，用感恩的心传递无声的另一种美丽。

2月2日，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新当选的副市长时光辉生于1970年，成为上海首位“70后”副省级官员。

汤彦俊摄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最近很忙，特别是去年11月30日，他作为8名与会专家之一参加了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座谈会后，其“不要搞运动式反腐”、要“靠制度反腐”的观点就在媒体上频频亮相。马怀德说，媒体关注他，实际上关注的是中国的法治建设和反腐败进程。

三度参加中纪委座谈会

虽然曾在2007年和2009年两度参加过中纪委组织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也曾走进中南海主讲法制讲座，但是，去年11月30日中纪委的这场座谈会仍让马怀德觉得不同于以往。

马怀德还记得，此前1周，中纪委给他发来了会议通知，还特别注明要穿便装，这让他觉得有些不一样。更让马怀德意外的是，会一开始，王岐山便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座谈会我们改改会风，不念稿子，少说客套话”，并笑言“网上的意见够刺激的，我们都能听进去”。

有了这个开场白，马怀德在发言时便抛下了自己预先准备好的稿子，提出源头反腐需要制定《重大决策程序条例》、《政务公开法》与《行政组织法》这三部法律。“在我发言的过程中，王岐山频频点头，没有说什么。最后到他讲话的时候，他讲到制度创新的重要性时，提到了我发言的部分内容，肯定了我发言的重要性。后来，王岐山还说，方便时还要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聊聊。”马怀德说。

亲历多部法律的制定

在业界，马怀德以他在行政法学界的丰富经历和权威地位著称。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届诉讼法专业行政诉讼方向的博士毕业生，曾直接参与了《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诉讼法》（草稿）、《行政诉讼法》等多部法律的研究和起草工作。

从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本科时起，马怀德就对行政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师从中国行政法学界泰斗应松年先生攻读行政法硕士后，他

马怀德

给中纪委进言

本报记者 叶晓楠

对中国的行政许可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知道什么是行政许可吗？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审批。在中国，‘许可’过多过滥的现象一度让百姓感到难以适应。比如说，我给我女儿上户口就跑了十几次，盖了若干公章。”马怀德说。

早在1994年，马怀德就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建议制定行政许可法》的论文，《中国法学》全文转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也有了反应，马怀德随后成为了全国人大启动的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小组中的一员。

作为行政法学的长期研究者，马怀德还把目光投向了国外，多次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拉卓比大学及美国波士顿大学、耶鲁大学进修并做高级访问学者，还曾参加了众多的国际性学术会议。

马怀德记得，1995年3月，他到美国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时，短短的5个月里，阅读了大量的美国行政法原著，还编写了《案例诉讼法教程》。马怀德说，“后来，2001年2月，我又到耶鲁大学研究行政诉讼问题，并在2002年主持召开了中美行政诉讼法研讨会，听取了很多专家意见，对后来起草行政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很有帮助，收获颇丰。”

到2003年8月，《行政许可法》终于通过。“现在看来，由于这部法律关系到行政权力的利益格局，起草、通过乃至实施都不易。我对这部法律感情最深，也希望它能更大地发挥作用。”马怀德说。

马怀德的电脑桌面上，是心爱的女儿5岁时的照片。对于47岁的马怀德来说，工作或许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繁重的工作，占用了马怀德大量的时间。妻子说：“我嫁给了一个工作狂。”学生评价说：“马老师就是一个飞转的陀螺，永不停歇。”